

名著选译丛书

古代文史

宋
元
明
清

巴蜀書社

译注 王立言

审阅 董治安

西厢记选译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西厢记选译

(川)新登字008号

责任编辑：邵世强

封面设计：陈世五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西厢记选译

王立言 译注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9.5 字数150千

1994年7月第一版

1994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0册

ISBN7-80523-637-2/Z·79

定 价：140.00元（第三批35种）

译注

王立言

审阅

董治安

己亥年

一九九四年·秋

国家教委古籍整理
『七·五』规划重点项目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

程。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安平秋、马樟根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项

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础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

文力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语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前言

《西厢记》是中国古典名剧，是元杂剧的代表作。明代王世贞称它是北曲“压卷”的作品。《西厢记》在中国文学史的爱情主题的演变上，也有着重要的划阶段的意义。它是第一次出现的完整地写出恋爱过程、恋爱心理的作品。郑振铎在《文学大纲》中说：“中国的戏曲小说，写到两性的恋史，往往是两人一见面便相爱，便誓订终身，从不细写他们恋爱的经过与他们在恋爱时的心理，《西厢记》的大成功便在它的全部都是婉曲的细腻的在写张生与莺莺的恋爱心境的。似这等曲折的恋爱故事，除《西厢记》外，中国无第二部。”它反对封建宗法礼教制度，反对封建伦理观念，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伪善及野蛮残酷，歌颂青年男女对自由爱

情的追求。在中国封建社会理学思想日盛的时代，一部宣传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剧本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品，这不是很值得深思吗？郭沫若在《西厢记艺术上的批判与其作者之性格》中说：

反抗精神，革命，无论如何，是一切艺术之母！元代文学，不仅限于剧曲，全是由这位母亲产生出来的。这位母亲所产生出来的女孩儿，总要以《西厢》为最完美，最绝世的了。

《西厢》是超时空的艺术品，有永恒而且普遍的生命，《西厢》是有生命的人性战胜了无生命的礼教底凯歌、纪念碑。

关于《西厢记》的作者，从元末至明初都未见提出疑议。周德清《中原音韵》、钟嗣成《录鬼簿》、贾仲明〔凌波仙〕吊词、朱权《太和正音谱》都认为是王实甫作。自明朝成化、弘治以来，开始有关汉卿作、王实甫作、关作王续、王作关续等各种说法，但都没有提出什么可靠的证据。不过《西厢记》现存版本都是明刻本，《西厢记》在流传中经过后人修改这是事实，但它仍保留了王作的基本面貌。

王实甫，名德信，大都人，是一个熟悉勾栏生活的作家。《西厢记》的创作成就得到了当时文坛的承认。但是，关于王实甫的生平资料却很少，孙

· 楷第《元曲家考略》中引用《滋溪文稿》中苏天爵为王结写的《元故资政大夫中书左丞知经筵事王公行状》，认为文中王结之父王德信，即王实甫。王德信曾任“陕西行台监察御史”，在四十岁后弃官退隐。《雍熙乐府》、《北宫词纪》等书收录署名王实甫的〔商调·集贤宾〕套曲《退隐》中说：

〔后庭花〕住一间蔽风霜茅草丘，穿一领卧苔莎粗布袋；捏几首写怀抱的歪诗句，吃几杯放心胸村醪酒。这潇洒傲王侯！且喜的身登身登中寿，有微资堪贍赡，有亭园堪纵游。保天和自养修，放形骸任自由，把尘缘一笔勾，再休题名利友。

冯沅君、顾学颉等元曲研究家都同意并征引这些材料。但这些材料是否记录的就是《西厢记》作者王实甫，尚有疑问。

王实甫一生共创作了十三种杂剧，现在有全本流传下来的，除《西厢记》外，还有《四丞相高宴丽春堂》和《吕蒙正风雪破窑记》。《丽春堂》写金代右丞相乐善和右副统军使李圭矛盾斗争的故事。《破窑记》写宋代吕蒙正和刘月娥的故事。《破窑记》影响较大，刘月娥与吕蒙正的形象都较成功。

《西厢记》全名是《崔莺莺待月西厢记》，是一部以多本连演一个故事的杂剧。《西厢记》一共五本二十折，第二本中的楔子所唱为一套曲，所以有人认为第二本应是五折，无楔子。其他各本均为四本一楔子。

故事最早渊源是唐朝元稹的《莺莺传》，又名《会真记》。《莺莺传》是一篇传奇小说，这是最早的莺莺与张生恋爱的故事。传奇的末尾是以始乱终弃的悲剧为结局的。此后，莺莺故事，在诗词作品中经常被引用，或以《莺莺传》为题材进行再创作。如晏殊《浣溪纱》词、苏轼《雨中花慢》词等都引用了《莺莺传》中的诗句。秦观、毛滂有咏莺莺等古代美人的《调笑转踏》。宋朝的赵令畴又用这个题材写成〔商词·蝶恋花〕鼓子词。鼓子词对元稹《莺莺传》的结局，表现了惋惜的态度，以为这是一种永远的缺憾。“弃置前欢俱未忍，岂料盟言，陡顿无凭准，地久天长终有尽，绵绵不似无穷恨。”宋时还有无名氏的官本杂剧《莺莺六么》。

金代董解元写了《西厢记诸宫调》。学术界通常简称“董西厢”。它是用民间诸宫调的体裁写成的说唱文艺形式，董西厢对《莺莺传》故事做了彻底的改造。《莺莺传》始乱终弃的故事格局被打破，

从而突出了反封建的主题，丰富了故事情节，塑造了成功的人物形象。

王实甫《西厢记》是在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的基础上加工改写而成的。作品通过崔张二人共同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幸福爱情并最终获得美满结局的动人故事，体现出反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思想主题。它和《西厢记诸宫调》相比较又有所提高。《西厢记诸宫调》即已提出反对从封建家族利益出发要求门当户对的婚姻，但《西厢记》着力描写了崔张爱情多次遭到老夫人的阻挠和破坏，强化了封建礼教的统治和叛逆者之间的矛盾冲突，从而更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对青年自由幸福的摧残。另外，在《西厢记》里更明确地体现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思想。这就使《西厢记》杂剧在思想成就方面大放异彩。《西厢记诸宫调》是说唱文字，情节不够集中，如兵围普救寺一场，用了很多篇幅叙述对阵厮杀，处理失之过重。《西厢记》的戏曲冲突则更为集中。《西厢记诸宫调》的人物性格不够统一，如张生最后听说老夫人已把莺莺许了郑恒，不仅没有据理力争，反而退缩避让。《西厢记》杂剧中的人物，特别是张生、莺莺、红娘的形象，则塑造得血肉丰满，个性鲜明。两部作品的语言风格也迥然不同。因而明代

以后不仅戏曲舞台主要以王实甫《西厢记》为演出底本，就是说唱艺术中西厢故事也转而依据戏曲剧本了。

《西厢记》是一部杰出的喜剧，它的喜剧冲突既表现为对老夫人负义背盟，郑恒造谣欺骗的合理夸张，又表现为张生风魔痴狂，莺莺故作庄重和红娘热心快肠所造成的误会。两者互相作用，而以后者为主。由于作者放手按照喜剧的特点塑造莺莺、张生、红娘等典型人物，善于开掘人物的内心世界，把他们心曲中的隐微，形象、风趣地揭示出来，产生了强烈的喜剧效果。

《西厢记》的深刻思想内容，是通过戏剧冲突，剧中人物的行动体现出来的。《西厢记》中描摹最细微深刻的是莺莺。莺莺是一位深沉、幽静的少女，作品揭示了她青春的觉醒，对爱情的追求，以及成为封建礼教叛逆者的过程。特别是描写了她自身的思想矛盾和恋爱心理，使她成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典型。她早就由父母之命将终身许给了郑恒，本无爱情可言，但在暮春天气，不由自主地产生无限怅惘。她到佛殿间散步时唱道：“花流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春风。”当她遇到张生以后，经过隔墙联吟，不自觉地产生了爱情，神魂荡漾，情思不快，“这些时坐又不安，睡又不稳，我欲待登临

又不快，闲行又闷，每日价情思睡昏昏”。随着她心中爱情的萌生滋长，她对老夫人的约束越来越不满。当张生出面献退兵之策时，她对张生的感情更进了一步。谁知老夫人事过之后又变了卦，她一方面埋怨母亲，开始了内心的反抗，“俺娘把甜句儿落空了地，虚名儿误赚了我。”一方面，把心交给了张生。两人感情越深，莺莺表面行动就越矜持。她听琴时说“知音者芳心自懂，感怀者断肠悲痛”，她迫切希望两人到一起。但当红娘带来张生的简帖时，却又发起脾气，要去告诉老夫人，并声称自己与张生“只是兄妹之情，焉有外事”。她约张生到花园相会，但见面后又责问张生：“张生，你是何等之人！我在这里烧香，你无故到此；若夫人闻知，有何理说！”直到张生病笃，莺莺才真正和张生结合。

莺莺这种做假的态度决定于她的家庭教育和贵族身份，同时也和她的处境有关。她每迈一步都是不容易的。这反映了她追求爱情和恪守封建礼教两种思想的斗争；她也不能不考虑行动的后果，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如果被遗弃，她将无法存身。任何一个少女在追求爱情过程中都不能不产生矛盾心理，而每个人的心理状态又不可能不受社会条件的制约。莺莺这一形象的真实性和社会意义也就在这

里。莺莺是大胆的、刚强的，是封建礼教的叛逆者，又是一个矜持的、怯懦的贵族小姐。尽管她内心中炽热地燃烧着爱情之火，但她表面却仍是一个深沉幽静的闺中少女，这便是王实甫笔下的莺莺形象。

张生是一个“才高难入俗人机，时乖不遂男儿愿”的狂生。他在普救寺和莺莺“刚刚打过照面”，便“风魔了”。第一次和红娘说话，便自我介绍生辰八字，并特意强调“不曾娶妻”；十分痴情。墙角联诗后，他情不自禁地望着莺莺竟呆在那里，还是被宿鸟惊醒：

〔幺篇〕我忽听、一声、猛惊。元来是扑刺刺宿鸟飞腾，颤巍巍花梢弄影，乱纷纷落红满径。

他通过不懈的追求，终于赢得莺莺的爱情，他是一个志诚种。同时作品也写了他的才华，他临危不惧，敢于挺身而出，急人危难。《西厢记》还加强了他忠于爱情，轻视功名的思想。张生的形象比《莺莺传》里有很大变化，比《西厢记诸宫调》中也有发展。但他身上仍有轻狂和猥亵的言行，这是和元代杂剧作者某些放浪行为有联系的。

红娘是《西厢记》中一个主要角色，全剧二十折戏，有八折由红娘主唱。特别是第三本《张君瑞